

追尋歷史的生命力

訪杜正勝院士

時間：200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

地點：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會客室

前言：簡訊編輯為了這期的院士述學，安排了一場對杜正勝院士的訪談。談的主題是他對歷史研究的學思歷程，以及從學院研究工作到故宮博物院的掌理之間的所思所得。參與訪談的人包括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研究員林開世、史語所助研究員李尚仁，以及社會所助研究員、也是簡訊主編范雲。



范雲：您一開始是從中國周代城邦研究起，是蠻正統的中國史的東西，而您在某個時期開始轉做台灣史，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講，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樣一個研究歷程的轉變，不曉得您怎麼看待這樣的轉變，能不能請您回顧一下各個階段的學思歷程？（林開世補充）：我想您最重要一個轉折恐怕不是轉向台灣史，而是一九八〇年代您轉走文化史、精神史這方面，這好像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。

杜正勝：我一九七一年唸台大歷史研究所，後來公費留考去英國，公費留考的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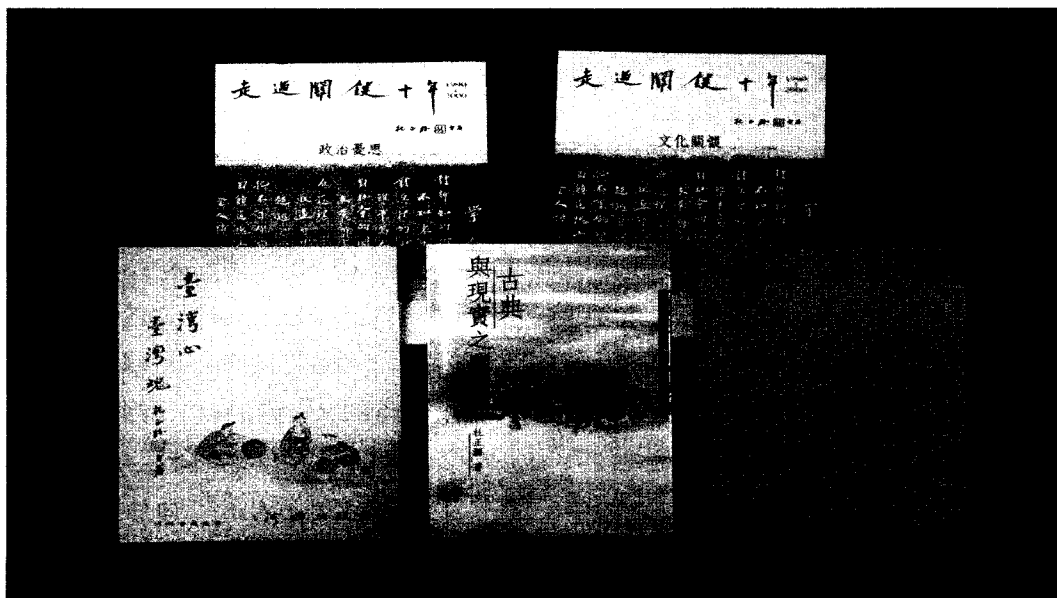
目是唸西洋史。在英國，西洋史就是英國史，而且比較專一點，主要是英格蘭中古史。因為教育部公費有年限，而且在台灣，我衷心欽佩的指導教授沈剛伯先生已年邁，我也想跟他多學一些。當然，那時代我不想在國外唸中國歷史，這跟我當時的心態有關，帶有一點傲慢的「民族主義」吧。那時候有個想法，今天回想起來不是很正確，不過那時候因為年輕，覺得到別的國家去是要學他們的歷史，我不願意去別的國家學中國歷史。回台灣之後，自己一面教學，一面研究。

整個七〇年代，我的研究是屬於中國上古史（中國古代史）的範圍。在過去教育部的課程規劃中，中國古代史屬於斷代史，是類似秦漢、隋唐的斷代，但實際上，中國古代史的時間拉得很長，具有通史的性格，是一個宏觀的、幾千年歷史。這段歷史和之後的歷史比較不同，它沒有多少個人可以研究，因為資料太少，你不可能去研究某一個人，自然而然整個思考方式，是比較接近社會科學的，會考慮國家體制、社會結構。譬如說我研究周代城邦，其實就是一個政治社會結構的問題，之後研究的《編戶齊民》，也是政治社會結構的問題。在這個時期，我研究的歷史基本上都是沒有個人的，我的古史論文裡面，真正有個人只有周公一篇，其它所有的論文都不是研究個人的。

在七〇年代，包括我在研究所時期，以及到國外唸英國歷史，之後回來教書這樣

一個時期，大部分時間多是投注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，對中國歷史提出比較長程的一種解釋。在我看來，我講歷史是以過去的一萬年為目標，這一萬年是從考古學所謂新石器時代，或者說農村的開始，來作為一個斷限。農村開始也就是人群開始聚集，這是屬於村落的階段，差不多在一萬年前開始，直到五千多年前開始形成國家，所以第一個起點是農村。第二個大的起點是國家的出現，我的理論是城邦。第三個點是帝國的出現，帝國的出現是在兩千兩百年前。我是這樣看中國歷史的發展。

我的《周代城邦》這本書，其實就是處理第二個階段「古代國家」，中國的古代國家從五千五百到兩千五百年前，差不多這將近三千年的時間，是城邦的時代，《周代城邦》是這時期最後階段的著作，以後陸陸續續寫的一些論文，把周代的城



邦再擴大、再往前討論。城邦時代相對而言，跟後來的歷史關係比較遠，但影響並不小。到了城邦晚期所完成的「古典」，則變成中國帝制時期或傳統時期的思想泉源；或者說中國文化從政治社會到人倫的最基本規範，大概多是在城邦末期確定下來的。這些文獻後來經過解釋，到西漢整理出來的便是我們所謂的五經、十三經等等，成爲一個強大的古典傳統。在過去兩千年的帝制裡面，古典不斷被解釋，不同時期、不同派別對古典有不同解釋。這是我研究的第一個階段，從政治社會的角度講，我稱之爲「城邦時代」。

接下來，我第二部比較重要的著作是《編戶齊民》。《編戶齊民》是講城邦解體到帝國形成的過渡階段，大概從西元前第六世紀到西元前二世紀，將近四百年的一个轉變。它不只代表這段時間，在我看來還有更重要的意義，即如《編戶齊民》的副標題所說的，它構成中國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基本成分。中國之後兩千年的帝制，它的社會結構基本上是在這四百年形成的。所謂基本成分，一個最明顯現象，在我看來就是「編戶齊民」，有一群社會最基層的群眾產生了，這些群眾是作爲後來整個帝國的基礎。以後的歷史，不論在政治上如何波動，它的這個架構都沒有變。以平等的人民作基礎，也就是所謂法律之前的平等，在上面架起一個官僚體制，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，最高就是以皇帝爲首，這樣子統治下來，這種政權的特點在於，人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。

如果有下一波的變化，借用社會學的名詞就是「公民社會」的產生，自主性社群、自主性個人的出現，來組成政治社會結構的基礎。我想我們台灣是逐漸在往這一方方向走，而中國那邊，如果他們願意走這條路的話，我想他們還要再奮鬥。一九一一年宣統被革命革掉了，中國好像沒有皇帝了，但事實上中國還是有「皇帝」，我們台灣也要到一九九〇的時候才真正沒有「皇帝」，在這之前也是有「皇帝」的。中國那邊現在也還有「皇帝」，只是沒有皇帝這個名稱，其實它的社會性質沒有變，它還是維持原來帝制的結構，我剛才提的那種公民社會還沒有形成，所以它還是一個編戶齊民的社會。

我研究編戶齊民的一個最主要重點在這裡，《編戶齊民》是一本學術著作，我有相當細密的論證，這樣一個社會從西元前六世紀到西元前二世紀，它是怎麼樣形成的，有什麼特質，這是我論述的重點，而剛剛的發揮則是我的歷史概念。根據我的判斷，以後的歷史基本上沒有脫離這個架構。我研究歷史是架構性的，五千多年之前開啓城邦時代，之後直到兩千年前開始編戶齊民的時代。

歷史追根究底是在研究人

我在一九八〇年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服務，這是最專注於我的研究、最沒有負擔的一個時期，像古代社會國家的種種論文，很多都是在這時期寫的。到了八〇年代後半，早至八六年，我開始反省、思

考，我這樣做理想嗎？歷史該研究什麼？城邦論也好、編戶齊民論也好，我基本上是做一種政治社會結構的論述，但是歷史追根究底是研究人，我之前那種研究方式是不是真正觸及到人？我自己在反省真正體驗到人群的特點嗎？我覺得有所不足。當然在這當中，還有我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思想論戰。我寫《周代城邦》的時候，中國那邊的歷史學家的基本架構，是對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爭辯，我要跳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爭辯，所以提出「城邦」。按照他們的理路，對於從奴隸社會轉變到封建社會的時期，各派有不同的觀點，但接下來的階段他們都叫封建制，我談的帝制（帝國），從社會的觀點是編戶齊民。

我反省一個問題，雖然我這些討論方式都不是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路子，但有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思考方式？其實並沒有，我並沒有真正接觸到人群的特質。於是我開始思考，應該怎麼樣才能更接觸到歷史上人群的核心。坦白講，馬克思主義的書我所知有限，但還是看了一些，他提出歷史研究要從表層到內裡，這是很深刻的見解，但我們要如何從表層進入到內裡呢？我以前所做的研究是架構式的，是國家政治社會的體制，這些好比是人的骨骼，但對於血肉、精神部分，我卻還沒有觸及，這部分是文化史、精神史的範疇，也就是從這時候，我開始思考所謂新史學的問題。

新史學的範圍當然很廣，過去這十年

來，一些年輕朋友做得比較多的，也是早先我做了一些的，是生命、醫療的問題。我覺得要接觸人群，就要知道這些人對於生、老、病、死各方面的看法，甚至不只是看法，而是以此發展出的文化，它真正成爲一種行爲、一種習性，譬如生病吃什麼藥、從什麼理路來看待疾病，對人體的理解，由這種理解帶出疾病的診斷、用藥，這整個形成一個複雜的文化體。如果只談空的生死思想，這是哲學、宗教學的命題，我是要具體的，從物質文化、行爲習性開始，當然也會觸及觀念。這是我從原來的政治社會架構走出來，開始接觸到文化方面，或者年鑑學派所謂的mentality（心態）的層面，是這樣一個過程。

文化轉向與「世俗化」的宇宙觀

林開世：我覺得很好奇的是，像我讀了李建民的書，讀完之後我嚇了一跳，因爲他某個程度上是在挑戰您的整個社會史的框架，等於說這事實上是一個文化的轉折。對您來說，您有沒有去重新修正您以前的那些說法，在一些新的材料、新的研究出來之後，您有沒有覺得哪些部分不是像以前想的那樣，是用社會史的觀點沒有掌握到的問題，有沒有什麼地方您覺得應該做修正？

杜正勝：我想是這樣，因爲歷史是一個整體，好像我們切片一樣，它可以被一層層切開，有些層面具有相當的長遠性，有些層面則變動得快一點，譬如像政治鬥爭大概是變得最快的，而經濟因素、生態因

素則比較長遠，像大家所熟悉的Braudel所說的地理因素，那是最基層、最長遠的。從城邦到編戶齊民，從城邦到統一帝國的轉變，按照我的理論，城邦維持了兩、三千年，帝制也維持了兩千年，這算是相當長遠的。

順著你剛剛那個問題，是不是以後就是如此？我們如果把這樣的轉變放到春秋、戰國，差不多西元前五世紀到西元前二世紀的轉折過程，是不是只有一種面貌而已？在我看來，在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裡面，有一種「世俗化」的宇宙觀，這跟政治社會的轉變幾乎是同步的。在探討中國古代對於人的生命問題中，我對於「世俗化」並沒有太多的著墨，但是基本的思考方式是這樣，在以前，人們相信生命是來自於祖先，後來轉而相信來自於天、神，自己是無法控制生命的，基本要透過祈求天神或祖先來協助。

世俗化的宇宙觀認為，經過一套處理架構，人們覺得自己可以預測、掌握生命，化為實際的文化行為則開始衍生出一套養身文化。我引用中國古典兩句話，在之前那個階段，像商紂王所講「我生有命在天」，我的命是天給的，當然這天命含有政治意涵。到了漢代之後，可以歸納出以後屬於道家文獻的仙經，那是「我命在我不在天」，人是可以操縱自己的生命的，落實到練氣功、服食各種藥物等，這是人來掌控自己。推及到整個宇宙觀，譬如後來有五行說，我們可以說那是假科學，但是它有一套邏輯性，它能進行解釋，這種

世俗的宇宙觀成為以後中國人最底層的心態。

以前我也講過，這種文化的發展形式是滾雪球，它不是從甲型態變而為乙型態，它是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，但是裡面的核心沒有變，外面包的都是一些技巧性的東西，後世發展而加上去的。我寫過一篇《內外與八方》，談的雖然是居住與隔離，但其實也是談整個空間的觀念，和一些玄妙的觀念也有關係。我用風水做例子，就歷史考據來講，我覺得我有一些發現，用我稱之為宅經的資料，早在先秦的時候就有屬於後來風水一類的東西，那時候風水的基本觀念已經存在，只是比較簡單。到宋、元、明、清以後，一些風水的書講得非常複雜，但是基本觀念沒有變。宅經我收集了相當的資料，譬如說從敦煌的《黃帝宅經》，到我們今天看到的印刷本，一般認為是宋代傳下來的《黃帝宅經》，敦煌本跟宋本的差別在哪裡，後來到明代講風水的那些書差別又是什麼，我有這些資料，也做過比較，只是沒有寫成論文而已。我發現它基本的理路、基本的概念沒有變，只在技術層面變得更繁複、更細密而已，這是滾雪球式的。

如果說有一些異說出現，我想這是因為中國這麼複雜、這麼廣大，但其實所謂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沒有變。如果我們要講在秦漢以後在心態上，我可以舉「世俗性」這樣一個思考方式為例，它是很本質的。我應該繼《編戶齊民》，好好再往這方面下功夫，這涉及到很多，從醫療、風

水到其它雜七雜八的部分，我想這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工程。

我知道經脈的理論，以現有的資料，李建民是比較傾向於覺得應有不同的來源，這是從經脈發展的理論來說，我覺得他的說法也可以成立。以前我在寫的時候還沒有那麼多資料，但還是希望能建構一個發展的過程，一個完美的典範當然就是黃帝內經。比黃帝內經還早的資料是馬王堆醫書，這是西漢初期，但是我們判斷它的年代應該可以早一點，比他埋葬的時代還要早一些。我希望從十一經脈到十二經脈能夠建構一個發展的過程，這當然好像是有點單線推演的理論。這當中能夠用的資料就是史記扁鵲倉公列傳，尤其是扁鵲倉公列傳的醫案資料，經過歸納分析以後，還從他的學術淵源、知識來源，可以推到戰國晚年的人，所傳下來的整個基本理論是如何。這當然是有點像單線演化，但所謂多種來源的資料，就大體系來說，還只是一個而已。人體生理結構的理論，中國也只是經脈這個體系，和希臘羅馬醫學，印度醫學以及藏醫醫學形成明顯的對比。目前我尊重李建民的談法，但我還是保留對文化核心特質的假設，反正以後還可以再繼續討論。

這其實比我談的「世俗化」還浮到上面一點，還不是最基本的，真正要瞭解中國人的心態、思考方式，從文化的觀點來看。不要把世俗化變成抽象的哲學概念，如果把它變成抽象概念，〈也許我不是一個哲學史家，但至少我作為一個歷史家〉

我覺得大概做不出什麼大名堂；應該要從文化的觀點，也就是從生活起居所涉及到的各方面，包括習俗、信仰，要從這些方面去找，看看不同時期、不同地方的發展是怎麼樣。

范雲：我覺得這非常有趣，我自己唸政治社會學、歷史社會學時，讀的都是西方社會史發展的文本。以那樣的文本來作一個想像，我覺得有一個蠻平行的地方，如果把剛剛您談到的題材當成政治社會學中歷史的面向，您後來是往物質文化的方向去尋找人。我聯想到在處理西方社會史的時候，社會科學有一種反省認為，如果我們只處理macro的東西，我們是看不到人的，譬如說為什麼是從城邦，或是說從諸侯出現，然後到布爾喬亞階級的興起，為什麼革命會發生？我們想理解在歷史變動的圖像中，不同social actor的rationale是什麼、他們為何會參與那些行動？因為我看到您走的路徑是往文化的方向去尋找人，您有沒有考慮過往另外一個方向去尋找人？

杜正勝：你讀的這些書我不熟悉，但是以我的理解，第一個是說社會科學家喜歡用比如像macro/micro的對立，也許政治社會結構是屬於macro，比較屬於文化的是micro。正如以前我這個年紀的人當學生時代，台灣的社會科學家也喜歡引用像大傳統、小傳統，好像經典的那些是大傳統，習俗信仰是小傳統，基本上我的思考分類不這樣做。

什麼叫macro、什麼叫micro？什麼叫

大、什麼叫小？以大傳統、小傳統來講，我們說儒家經典是大傳統，一般民間信仰叫小傳統，是比人數還是比影響力大小？大傳統恐怕才是最少人去執行的，它之所以成爲經典，是附著在政權之下，但真正政權其實也不完全按照儒家，所以這回歸到歷史會有很大的問題。基本上我認爲，要看它成爲一種架構以後，它涉及的層面多寡的問題。譬如說帝制成爲一種架構，你只要在它的政權統治之內，你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只要這樣的體制沒有改變，任何人就不得不在這種體制範圍內過活。政治社會架構觸及到某個層面，譬如說你被它統治，它要你交稅你就交稅、要你服役你就服役，反皇帝的言論是罪大惡極，你就是在這樣的體制裡面，儘管如此，你只要沒有和政權產生對抗，你還是可以拜你的信仰、過我的習俗。

所以我認爲，光看這個機制還不夠，還要看另外一個，另外一個機制同樣也是架構性的，像剛剛提到的世俗性的思考，這樣的架構影響很多人，只是有的人會把它理論化的講出來，有的人不會。例如像食物有冷熱、生病有冷熱，基本上還是一個陰陽的二元觀念，基本思考方式還是這樣，這也是一種結構性的，是一種心態或思考方式的結構，這種結構會觸及到某些層面。在我的感覺，並不是說政治社會架構可以取代心態，或者心態可以取代政治社會架構，要看整個歷史的全貌，應該要將兩者結合在一起，未來的歷史家，我指的是年輕一輩的歷史家，一個最艱鉅的工

作就是如何結合兩者。

我在七〇、八〇年代研究政治社會的結構，到九〇年代開始研究文化，我不曉得別人怎麼看，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領域，但我自己本身是希望把這兩個合在一起。以一些常識性的理解來說，我看過一些報導、範例，譬如有一篇Braudel的訪問稿，Braudel應該還是算結構性的，短、中、長程的結構，他的徒孫一輩在做的其實就相當不一樣，對這種現象他好像頗有微詞。其實他們碰到的問題也是這樣，要如何把Braudel做的，和徒孫做的研究結合在一起。

歷史是一個整體，但是歷史研究者當然是就自己方便去研究，好像切片一樣，把它切某一片來觀察，但由於歷史是一個整體，未來政治社會的架構和文化心態的架構，在論述的時候要能互相參照。當然我們也知道，在其中會有一些變化，也許有的變化會維持五十年或五百年，有的變化維持一、兩千年，並不是一切都同步的，而是不同的線疊在一起，從底層到中層、上層，不斷在參差轉變，整個過程我只能抽象的這麼說。作爲一個歷史研究者，不能只是抽象的這樣講，他要做具體的論述，具體的論述就看他選的課題、切入點，但一定要能跟背後更大的架構產生聯繫。

給年輕人的建議：

成一家言

…如果要給年輕人一些建議，我比較不

贊成想到一個小題目寫一點，我覺得還是要做比較全面性的思考，到某個階段之後才寫。在專業化之後，好像很多人是不斷地寫，我們只是看書目就看得頭昏眼花，但終歸歷史家還是要像司馬遷所說「成一家言」…

范雲：我們剛剛已經討論很多實質的研究內容，現在要回來問您做學問的心得和感想，譬如說您有沒有困頓的時候？有沒有什麼研究的瓶頸？或是您走過這條路，看我們這些後來的、年輕的一輩，您有沒有什麼希望後輩可以從您身上學得的經驗？

杜正勝：如果純粹從技藝性來看，也就是真正去操作，寫書、寫論文就是一種技藝的表現，從這方面來講，我不像某些人拿起筆就寫，我整個醞釀、思考的過程，大概跟女人生孩子的過程有點相似。在以前還能專心寫作的時期，我大概要思考得差不多，整個架構已經有大致的規模，然後才會下筆寫。當然，下筆寫之後會有新的想法產生，但是在醞釀要下筆寫的那段，那是一個最痛苦的時期，因為很多混沌的想法都還不是理得很清楚。等到開始下筆寫，條理慢慢出來之後，越寫會越順，到整個初稿出來之後，就像孩子生出來一樣覺得鬆了一口氣。

如果要給年輕人一些建議，我比較不贊成想到一個小題目寫一點，我覺得還是要做比較全面性的思考，到某個階段之後才寫。在專業化之後，好像很多人是不斷地寫，我們只看書目就看得頭昏眼花，但終

歸歷史家還是要像司馬遷所說「成一家言」，司馬遷的這句話是很客觀的。所謂「成一家言」，指的是成我一家言，同時你也有一家言、他也有一家言，歷史是各種說法，也許就是要綜合很多種說法才能真正見到全貌。對每一個歷史家來講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成一家言，自己的說法就是一個完整的體系，同時，歷史家也要有個心理準備，你成一家言以後就是一家言了，但還會有很多別家言，本來歷史就是如此，沒有定於一尊的。

歷史是一種解釋，成一家言就是一種解釋，差別只在於誰的解釋比較精彩，或者誰的解釋比較有道理、比較得到認可。我講的是比較大的理論，不是講小的考證，小的考證其實是有許多可以見真章的，譬如資料引錯了、解釋明顯錯誤，這是可以馬上糾正的，但是到了一個比較大的理論，其實是level的問題了，已經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，有人提出的理論解釋性更廣、更有說服力，有的可能破綻比較多，大概是這樣子。

推動「新史學」的影響

李尚仁：剛剛院長提到您在八〇年代推動新史學，研究一些跟文化史有關的東西，您也提到希望這些能跟比較長程的東西做整合。我個人進史語所的時候杜先生已經離開，不過我也是您推動這個新方向的受益者，包括您推動新史學雜誌等等，對國內史學界走向有很大的影響。經過您這幾年的觀察，不曉得您對國內史學界的

狀況，包括哪些領域您覺得應該再進一步去探索，或者哪些方向是可以進一步去走的？

杜正勝：我對這方面沒有很仔細觀察，但既然你提起這個問題，我就以平常想的來談。我剛剛講過，我的研究對象是人群，是比較基層社會的，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領域我們沒有好好做，籠統說叫做「民俗」，當然這不是指民俗學，我講的「民俗」是涉及最基層的人，而且所觸及的層面是和心態、思考方式比較有關係，我想在這方面我們做得還不夠。在文獻的收集方面，要把區域、族群因素放進去，不要籠統地等同看待，當然做歷史研究要將時代區隔考慮進去，民俗有它的延續性，但也有它的變化，我還是用滾雪球這個比喻，你看到的延續性是它的本質，它的本質不變，但是它外面包裹的在不同時期、區域各有不同，這是我們要注意的。

民俗跟田野調查有關，歷史學的研究不會只限於書本文獻，它跟田野也會結合在一起。瞭解一個族群的文化特質，我想那是最能代表大多數人的，當然，如果有一些個案它能反映多數人的狀況，這個個案也須要研究；雖然有的歷史家喜歡做這樣的研究，但我的興趣不在此，我認為不能只是講張三、李四如何如何，基本上這不是我的研究興趣。我覺得每個人的生命有限，我要投注我的時間、精力到一個更大的對象，即使個案，也希望能反映大多數的人。這是回答剛剛尙仁兄的問題，我想這個領域我們要去開發，不論從你們

所熟悉的醫療到信仰等，都涵蓋在我所謂「民俗」的範疇裡。

另外，我覺得不能把中國的歷史單一化，至少現在所看到的疆域，是從清朝盛世傳下來的這麼大的領域，它的生態環境、生產環境不同，所影響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樣。再來是歷史所造成的族群不同，族群不同所帶來的是語言、文化、信仰各方面的不同，所以就以今天中國本身的疆域來說，我們還是要有多元的觀念。第二個，研究中國歷史不能只研究中國，中國是在東亞世界內，更是在整個亞洲，甚至是歐亞大陸之內，在過去的一萬年、五千年、兩千年等，人群往來是非常頻繁，沒有今天的政治疆界，這當中族群移動所帶來文化交流相當複雜，應該至少以整個亞洲作為我們思考的基礎，這方面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不夠，學者的視野也不夠。

林開世：台灣史方面，您的主要作品是“《番社采風圖》題解”，及一些圖像考證。

杜正勝：對，這是後來我思考歷史教育、歷史觀點的一個副產品。我提出「同心圓」的觀念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歷史當然是從周遭熟悉的環境學習起，不可能一個英國人先去學非洲的東西，他當然是從英國、歐洲大陸認識起，這是很自然的。過去因為國民黨政府來了以後，中華民國代表整個中國，而且國民黨爲了要清除以前日本的遺留，所以用非常強烈的方式，在語文、歷史、地理、公民與道德等方面，用所謂中國的文化來教育台灣是中國

的一部份。

這種情形在八〇年代晚期、九〇年之後，整個情勢變了，從政治方面來講，台灣的主體意識抬頭，台灣人有一個極高的渴望，想瞭解我們是怎樣的人、我們是怎麼來的。以前是以中國文化為大樹幹，台灣是其中一個小分枝，隋朝的時候講到一點，元朝、明朝講到一點，最後是什麼反攻復國的基地，以前是用一種零碎方式去講，沒有一個整體的觀念。現在是這樣，台灣跟中國隔離五十年，台灣在經濟方面的發展有自己的特色，在政治方面也走出自己的一條路，它已經不是以前帝制編戶齊民那套可以解釋，它已經進入另外一個階段。在台灣的人有一個渴望，想要知道自己是什麼，當然這要從這塊土地本身自主性的認識開始，它不是附屬品，北京人、山頂洞人、仰韶文化、龍山文化這樣一路講下來，台灣變成是一個附屬品，但台灣絕對不是一個附屬品，它要重新瞭解自己是怎麼樣。

其實在中國各個地方也是一樣，浙江七千年前是河姆渡文化，它不會說浙江文化是來自陝西半坡。同樣的道理，中國各個地方都有類似的情形，只是在台灣，在脫離中國之後卻變得更中國，國民黨來這裡的教育是使台灣脫離中國後更中國，塑造一條中國歷史單線發展的線，其實這條線用到今天中國各個地方都是不通的。我們在台灣，至少我們要瞭解自己，所以我才會提出所謂同心圓的史觀，而且台灣不能只瞭解自己，還要往外瞭解周邊環境，所

以是一圈圈的擴大出去，同心圓史觀其實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史觀。

回到我研究的《番社采風圖》，當然研究是有機緣的。史語所收藏這麼好的一本書，我覺得可以提供給研究台灣史的人參考。我本來只是要寫一、兩千字的導言，但是我雖然只要寫一、兩千字，我也要弄清楚，不可以隨便。所以我就去收集有關的資料來閱讀、構思，直到腦中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藍圖出來。平埔族的一個picture已經形成了，一寫就變成一篇很長的論文，也算是一本書的形式了。

在我整個的研究裡面，當然我不敢說我是研究台灣史的，但是我至少可以提出一點，我研究了台灣上古史，台灣在西元一千六百年以前是原始社會，到一千六百年還是原始社會，是外力進來了以後，台灣才脫離原始社會，這個外力首先是荷蘭。荷蘭人來，把台灣從一個孤立的原始社會納入世界體系裡面。接著是鄭成功來，明鄭很短，只有十八年。再來是清朝征服台灣，把台灣一下子納入中華帝國的體制裡面，台灣被納入中華帝國體制，就跟世界體制脫離、隔絕了，它就變成中華帝國的一部份。不論進入世界體制也好、進入帝國體制也好，台灣都離開原始社會了，離開原始社會的主要動力是外力不是內力，它一下子做了一個極大的跳躍。我所研究的，基本上是台灣從原始社會進入世界體制和帝國體制，我用的資料是世界體制的人的記載、帝國體制的人的記載，這可以算是台灣的上古史，這是我的認識。

我覺得研究台灣史是一個責任，雖然我自己在這方面做得不多，但我不是孤伶伶的來做，而是思索台灣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上，它到底佔有什麼樣的位置，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目標，也許台灣史的專家比較少這樣思考吧。

接掌故宮博物院： 從學術到學術教育

…我因為這份工作而接觸一個新的領域、一種新的生活方式，作為一個歷史學家，這讓我有機會體驗什麼是政治、什麼是社會。…

范雲：我們也相當好奇杜院長從院士身份到故宮，也就是從學界到一個比較著重社會實踐的位置，是不是有些什麼心得可以和學界的朋友分享？

杜正勝：回答范小姐這個問題，一般人會問我怎麼從學術界到政治界，當然在我們的體制中這個位置是屬於政治的，但是從我一年多以前考慮要接受這個位置，經過一年多來的經驗，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基本上是一個學術教育的機構，它不是一個行政機構。

這個機構本質上是學術和教育的，在學術方面它是藝術史的研究，當然也帶一點博物館學，不過還是以藝術史為大宗；在教育方面，它是藝術推廣教育、社會教育，因為博物館、美術館即是公共社會教育的場所。國立故宮博物院是一個fine art museum，它不是自然史博物館、也不是

交通博物館，它是屬於藝術博物館，所以它的任務就是「藝術教育」。博物館本身既是一個社會教育的場所，那麼art museum當然就是一個藝術教育的場所。它雖不屬於正規教育裡面，但是一開門、一有人進來，其實就在接受這個博物館所提供的某種型式的藝術教育。對於國立故宮博物院這樣的認定，可以說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改變。

對我來講，我以前熟悉的工作是在歷史學研究。我在中央研究院待了二十年，在此之前我是在大學教書，可以說我的工作是在做-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。故宮博物院這個機構的性質，跟我以前的經驗、我所熟悉的一套謀生技能，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異，我是在這樣的判斷和考慮之下，我想我既然被徵詢到有這樣的機會，所以就考慮暫時換一個工作看看。坦白講，這當中也不只是這麼單純，當然我也考慮到因為政權的輪替，一個新的政府產生了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既然是政府部會之一，也需要注入一點新的成分、新的力量，對於這部分我當然願意來試一試，看看能不能推動一些改革，這是我當時接受這個工作的主要考慮。

范雲：您那時候沒有掙扎嗎？決定您的時間要花在繼續從事重要的學術著作，或是來做這樣一個比較是實踐的教育工作？

杜正勝：「掙扎」兩字是講得太嚴重了，反而是有一些考慮。今天回想起來，我那時候的判斷是不是正確呢？我自己當然也可以來反省、檢討一下。因為我在史

語所的時候也負責學術行政，在史語所我也不可能一天從早到晚只是讀書，我還有一些公共的事務要做。那時的判斷大概是覺得，來這裡大概還有時間可以做研究，當然從這點來講，一年多來的經驗告訴我，當時的這種判斷是不太正確的，也就是說，故宮博物院的這個位置跟史語所相當不同，它複雜多了、繁複多了，它對內對外的關係多了，遠超過我在史語所當所長的行政負擔，所以難以專心投入研究，從今天來看，我當時的判斷是過份樂觀了。

在史語所時期我還能兼顧研究與行政，我在史語所當了五年的所長，在這五年內我還是有著作、論文發表，我也得到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，甚至於在這五年中我也開啓了新的研究領域。但在這一年多的經驗裡，我覺得相當困難，因為這裡內內外外的事務繁多，尤其它幾乎是一個涉外單位，是外賓經常來拜訪的地方。只要在某種層級以上，相關單位就會要求故宮接待，如果對方是比較重要的貴賓，一般都是院長要親自接待，所以我這類事情做了不少。反而這是在這個位置上的人該做的事，是本務。就個人人生來說，增加一點人生經驗，但是對一個學者而言，專心做研究的時間當然也被剝奪了。我總還希望盡量找時間讀書研究，現在的研究只能配合我的工作，比較屬於美術史、博物館學方面，不敢預期能做到什麼程度。

但是，我因為這份工作而接觸一個新的領域、一種新的生活方式，作為一個歷史

學家，這讓我有機會體驗什麼是政治、什麼是社會。以前作為一個歷史學家，基本上只是從書本上得到知識，但現在我的工作自然就會促使我接觸這類事情，使我能真正去體會。當然，我希望這個經驗對以後我的歷史研究會有幫助，即使我現在還不知道會產生什麼幫助。

研究歷史的專業人士，譬如像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、大學的歷史教授，他們要處理的其實是過去某個民族、國家（或是多民族、多國家）群體的事情，這個群體的事情包含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、思想等方面。但是當歷史學專業化以後，學風變成專注做研究，研究者沒有時間去接觸真正的政治、社會、人群，反而只是遠遠的看。研究者直接接觸的是資料本身，經過對資料的研判、思考，而後提出一套看法，這是現在專業歷史學者的研究模式。回到資料本身，資料有沒有辦法傳達實況？它能傳達到什麼樣的地步？歷史本來是探討過去人群的事情，而一個探討人群的專業者卻不接觸人群，他探討的結果、所獲知識的真切度有多少？這其實是我們學術界應該反省的。

在制度上，知識專業化以後，若要真正接觸人群，則很難在學術圈討生活，因為學術圈內部的競爭相當激烈，研究者必須很專注，也不可能有精力做其它的事，這變成一個兩難。舉文學家為例，若只是靠書本、文字記載的知識，一個人不可能成為最偉大的文學家，頂多只是文字或文學史研究者。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必須投入生

活、投入人群，而又要跳離現實生活、跳出人群，也就是說，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必須在現實環境和自身的理想環境之間、在現實生活和文字生活之間不斷互動，才能寫出深刻動人的作品。

歷史和文學一樣是探索人群的，因此歷史家也應該像文學家這樣子。當然，各個時期的歷史家有不同的風格，事實上東、西方許多歷史學家也參與實際生活，例如中國的司馬遷、希臘的Herodotus，他們都不是關在書房就寫出史記、寫出希羅多德的歷史作品。但是到了二十世紀，因為專業化的結果，歷史學家則非待在學院裡頭、非常專注；相當程度地脫離生活不可。這是二十世紀的時代風氣，我有這樣的體會，這並不是在為我自己辯護，有時我也未免迷惘，當一個歷史學家跟實際生活已經脫節的時候，這樣的歷史學家是怎麼樣的歷史學家呢？

林開世：我有一個理念上的問題，是有關故宮的經營。因為故宮博物院的特殊性，所以這個問題有它的敏感性，但我這個問題不是政治的問題。我想問的是，如果「博物館」的來源和歷史背景，一方面是殖民主義的產物，另一方面是民族主義的遺產，因此塑造成今天博物館的特性、呈現方式及制度。以台灣現在要走向一個多族群、多文化的社會，故宮這樣一個特殊的民族主義的產物，在您的理念上，您對於故宮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有什麼想法？

杜正勝：一旦博物館負起教育的任務，

它必定有所宣揚、有所塑造，對來參觀的人產生一種塑造作用，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情。以歐洲的經驗來說，博物館的興起應該是從文藝復興開始，文藝復興時期的博物館正是中文「博物」兩字的意思，它是動物、植物、礦物等標本的蒐集。西方的博物館有個特點，也是今天定義博物館的最基本本質，它是公開的、屬於公眾的，它是開門迎接所有的人，而不是純粹私人的收藏，這是博物館和所謂收藏家最大的不同。當然，以中國的傳統來看，過去歷史時期收藏家很多，很好的收藏品卻往往不輕易示人，除非好朋友來才拿出來品賞，這都不具備近代博物館的意義。近代博物館的意義是「公共」，這也是蔡元培先生談博物館一直強調的觀念，我覺得這觀念是絕對正確的。既然是公共，它就產生普及的教育作用，對大眾的文化、思潮產生影響。

你談到故宮是殖民主義、民族主義的結果，這的確是十九世紀以來到二十世紀的一種現象。我前一陣子寫過一篇學術論文《藝術、政治與博物館》，分析故宮的歷史，它的確走過民族主義這條路，現在還有人死抱住這條路不放。它從清宮的收藏開始，清宮的收藏並不公開。在紫禁城裡面，皇帝生活起居擺設、辦公空間就等於一個博物館，只有皇帝和他的近臣才看得到，完全是一個私人的collection。後來收歸國有之後，它變成一個公共的博物館，又因為中華民國受到日本入侵，發生抗日戰爭，故宮博物院選了一些精品南遷，在戰爭結束之後，因為國共內戰而到台灣

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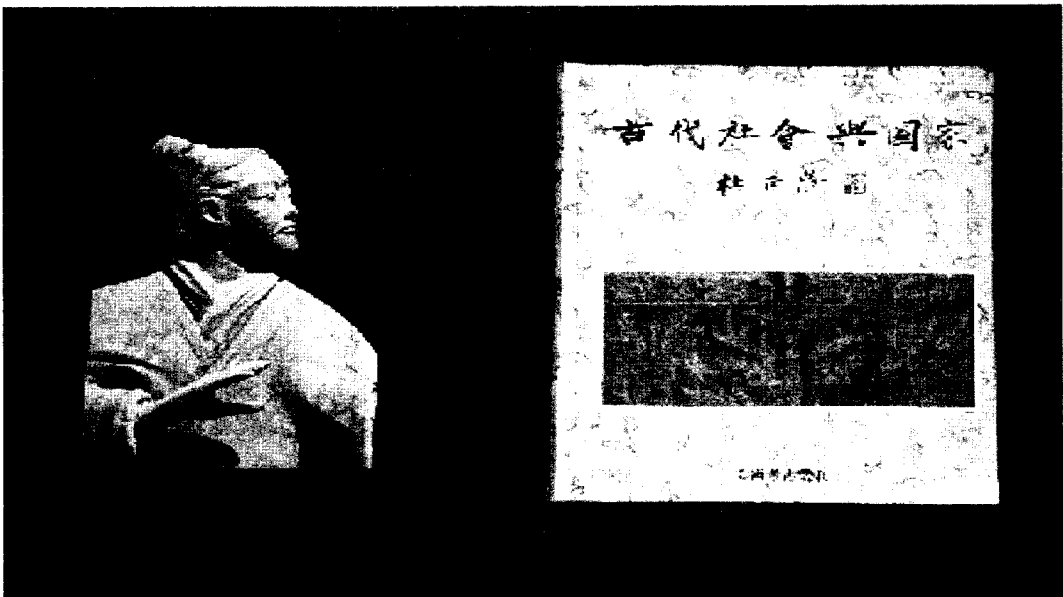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故宮博物院的命運跟中華民國的命運是同步發展，在這個同步發展的過程中，博物院和國家政權密切結合，關於這一點，世界上其它博物館大概找不出類似例子。經歷遷徙流離、動盪不安，博物院的命運等於國家的命運，它自然而然形成民族主義的性格，而大家所關注的也是這方面，其實它原來的藝術性還存在，卻被民族主義的性格掩蓋了。

無可諱言，過去這幾十年來，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的政治正統、也要代表中華文化的正統，在這樣的時期裡，至少是一九八〇年代以前，國立故宮博物院代表中華文化文化正統最具體的顯現，它也賣力地扮演這樣的角色。對於這樣的角色，從台灣主體意識的人來看，會認為這跟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進行的國族塑造過程是密切結合的，我的論文就是分析這樣一個過程，

這當然是二十世紀歷史的結果，我們現在是做一個回顧。

困難的是你剛剛的問題，當我們不再堅持政治的正統，甚至我們也不去跟人家爭文化正統的時候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該怎麼辦？以前是正統的時候當然它振振有詞，但是當它不是的時候呢？這當然有很多種說法。有人主張把它當作所謂「華人文化」，避開政治意味強烈的「中國」，把它當作華人文化，也就是承認台灣也是華人所在地，世界上有很多華人，從東南亞到歐美都有華人，當然在東亞世界中國統治的地區也是華人，而國立故宮博物院就是華人精緻文化的所在。

另外一種考慮是，它不只是華人文化，在它的收藏中，有五、六千年前的玉器，三千、兩千五百年前的青銅器，一千年前的書法、繪畫，一千年前的宋瓷，還有許多其它藝術品，我們如果回歸到它的藝術



本質，把這些最精緻的東西當作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產，像埃及的金字塔、希臘的雕刻、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等，我們如果能做到這一步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就不只代表華人精緻文化，它還可躋上人類文明遺產的列車，我相信本院有一部份可列入這個範疇，故也希望本院的經營能在這方面多所努力。

博物館裡一樣東西放在那裡，視覺印象覺得不錯，但它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價值、意義為何，這要經過一番解釋，而這個解釋需要透過研究，因此博物館的從業人員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。我個人覺得，本院典藏的文物與其只強調它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東西，不如在台灣現有的情境裡，去發現它的普世性，因為真正的美是普世性的，超越國家民族、文化的界線。我們喜歡貝多芬、莫札特的音樂，我們喜歡達文西的畫、米開朗基羅的雕刻，我們不必先肯定自己是德國人、奧地利人或義大利人，不必先identify自己是哪一國人，而是作為一個人類去喜歡這些人類的遺產，因為這是一些曾活過的人所創造出來的偉大成就。故宮博物院的藝術品也要能達到這個地步，不只是因為它是中華民族先人的遺產所以我們喜歡，而是作為人類所以喜歡它，這個過程需要研究者、博物館人員的闡釋。

林開世：收藏品還有繼續增加嗎？

杜正勝：收藏品的增加是這樣，我們還有一些預算可以購買，如果碰到合適的我們會買，此外，我們也陸陸續續有一些民

間的捐贈。

林開世：因為一直有新的東西進來，在選取要買的哪些東西時，由於這個博物館的定位是fine art，在您的理念上，您覺得應該繼續處理fine art，或者傾向於material culture等等？我的意思是說，就收藏品來說它已經相當固定了，您剛剛提到要將它公共化，那會不會牽涉到經營時展出方式的重新思考，或者以後收藏的重新思考，或是對於解釋的重新思考？相對於過去比較重視national heritage的想法，您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想法？

用世界性的思考取代 民族主義的思考

杜正勝：在基本理念上，當然就是我剛剛提到的，用世界性的思考取代民族主義式的思考。你剛剛談的涉及到一些實務，譬如說收藏方面。本院既有的收藏品雖不是樣樣精品，但是它基本的性質是一個fine art museum，不能變成一個民俗博物館，這是從東西的quality方面來考慮，所以不論是民間捐贈也好、購藏也好，基本上品質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。

第二個，有沒有什麼改變？我希望它能逐步跨出華人的範圍，這當然要有很多客觀條件的輔助才可能，要有錢、有機緣，但是我覺得在整個思考理念上，我們應該活潑一點。我現在的做法是這樣，因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是以中國或中華為主，擴大之道首先要先考慮它周邊的民族文化。這樣的思考有幾個主要因素，首先

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在我們國家的博物館界的角色，我們國家的博物館逐漸有分工出現，譬如本院的中華文物，北美館、台中國美術館、高雄美術館是以展覽台灣本土的美術為主，台東卑南的台灣史前博物館是以展覽台灣原住民文物為主，也就是屬於南島民族文化的歷史。在民間方面，台南的奇美博物館是以歐洲文物為主，尤其是歐洲的繪畫，以一個民間的收藏來看，它在我們國內是第一，雖然有人無法正視這個開闢草萊的偉業，但它還是做得最好的，所以我希望國內歐洲美術能集中在奇美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可以拓展的是亞洲，我們過去的教育讓我們忽略本土，不瞭解自己、不瞭解自己的鄰居，我們不曉得自己的鄰居是什麼樣的人，有什麼樣的文化，譬如像日本、韓國、菲律賓、印度等，更不必談伊朗、阿拉伯世界、中亞、北亞。我們整個教育系統是非常孤立的，博物館界的情形也差不多，我覺得我們應該來做這件事。本院的基本收藏是中華文物，中華文化是東亞世界最主要的一種文化，發展亞洲博物館至少我們已經有一些重要成分了，但同時我們應該把周圍國家的東西考慮進來。這是未來的發展，都在規劃中，但還是要看錢、看機會才可能，但至少我們有這個想法。這是在收藏方面。

在展覽方面，展覽的基礎來自收藏，有些博物館、美術館自己沒有多少收藏品，要不斷靠辦借展來刺激，但國立故宮博物院是有自己收藏品的一個博物館，它可以

辦借展，但借展絕對不是它的本務，它要好好研究自己的收藏品，並且對自己的收藏品提出一套解釋。有了深刻的認識、有一套解釋之後，就像端菜一樣，可以把佳餚一道道端上來，可以不斷以自身的收藏品辦展覽。該怎麼提出一套解釋？經營博物館和做研究一樣，對於歷史解釋，不可能一百年前這麼說，從此就不能變動，這在學術研究會變成笑話。同樣一件東西在那裡，我們該怎麼看？有這麼一百件東西在那邊，你該怎麼組合？一百年前、五十年前、三十年前，直到今天，解釋都會不一樣，解釋的不同有時代因素，另外也顯示我們知識的進步。一個博物館人員，正是要在解釋方面展現他的實力、研究水準。解釋就是策展，怎樣規劃展覽、安排展覽，怎樣選材、組織，這是最重要的；接下來，當然就是比較技術性的，怎樣把你的解釋用通俗的方式告訴大眾。

范雲：在presentation方面，台灣在這方面真的蠻弱的。我記得幾年前，故宮的中華瑰寶出國展示時，我到紐約的Metropolitan Museum去看這「中華瑰寶展」，我帶美國朋友一起去看，他們當然非常驚豔，但是我覺得那是對一個異文化的驚豔；而我對自己的文化比較親近，我看完的感覺是，我們對那些東西沒有進一步的學習和瞭解的效果。我們今天去看歐洲文化或許多美術展，我們會對某個流派、社會文化脈絡有更進一步的瞭解，但是看完中華瑰寶展，覺得我們好像只是把我們的東西搬出去，讓人家覺得這些東西好好有趣，可是整體來講似乎並沒有教育的

效果。

杜正勝：妳講的不錯，要把一件很深奧、晦澀的東西介紹給人家，讓人家覺得容易瞭解，而且發現文明的意義，這不純粹是技術而已。其實解釋是有傳統的，我們的博物館界剛起步而已。

我以前是待在英國，有一年我和我太太都得到資助去研究，所以也把小孩帶去，我自己和小孩子一起來看，像British Museum等等。我們一個週末去，譬如星期六，一天就只看兩、三間，而不是隨便轉一圈就出來。大家知道英國的Royal museum多是免費，進進出出都沒關係，不必買票，你可以去“讀”博物館，而不只是“看”博物館，在這當中我有深切的體會，人家的說明真的有深厚的傳統。

在South Kensington的Natural History Museum（自然史博物館），它有一層樓的一半在展覽達爾文的進化論，它的說明、陳列方式，可以讓一個對生物學外行的人看得津津有味，印象非常深刻。British Museum的收藏深入淺出，容易掌握關鍵重點，建立觀念，不論是埃及的也好、希臘的也好，譬如在我專業範圍的東亞、中國部分，他們的說明也很讓我佩服。他們用有限的文字，用人人可懂的表達方式，並且傳達的知識內容是正確的，這是我看了許多英國的博物館後，深切感受到他們的一面。

怎麼把深奧的研究成果表達出來，這方面我們的人才還很缺乏。另外，整個博物館應該不只是富麗堂皇的呈現，讓人感覺

有很多精品，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精品帶入社會、帶入個人、帶入人心，這是博物館人員應該努力的方向。這一年多來，我一直努力在這方面推動，現階段也有一些成果。以前這邊的專業人員、藝術史家，一下筆都是比較專家的方式，也就是專家看得懂，但一般人不一定看得懂。博物館只要一開門，各式各樣的人、從最老到最年輕的人都會進來，因此藝術品到了展廳，就不能以專家的思考方式去思考，而要以一般人的思考方式來表達。另外一個改變是，以前展覽的文字說明部分都很長，我硬性要求不能超過多少字，或者不能超過多少段，這是考慮一個來參觀博物館的人，他站在那邊讀的時候能站多久，他看了多久就會累了不想看，要從這些地方考慮，所以我硬性規定要在三百字或五百字裡面，把所要講的話講清楚。

這兩方面在一年多來有相當大的改善，更高層次的部分，還要不斷的努力。其次是展覽的主題，關於主題的選定，以及古代和現代如何對應結合的問題，要讓人看完藝術品有精確的知識，清楚的概念，而且要有感受，刺激參觀者想更多的問題。本院的書畫展是三個月換一次，上期有草蟲展，在古代畫的旁邊，搭配現代昆蟲的照片，那次做得還不盡理想。在十月份開始的「畫裡珍禽」，我們和野鳥協會合作，一邊是古代宋、元畫家畫的鳥，一邊是野鳥協會提供的照片，兩相對照，使整個展覽較為活潑，也使知識的傳達更正確，這些是展覽方式的改善。

杜正勝院士簡歷

學歷

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1971.9-1974.6

經歷

- 1974-76 倫敦大學政經學院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s)研究
(教育部留學獎學金)
- 1976-80 東吳大學歷史系講師、副教授
- 1980-8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
- 1983-84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
- 1984-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
- 1985.3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明耀訪問學人
- 1986.2-87.7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(合聘)
- 1987-93 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四組主任
- 1988.7- 大陸雜誌主編
- 1989-92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
- 1990- 新史學主編
- 1992- 中央研究院院士
- 1992-93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(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)訪問學人(國科
會資助)
- 1994-95 教育部顧問室顧問(兼)
- 1995.4-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
- 1995-98 國立編譯館教科書「認識臺灣(社會篇)」主任委員
- 1997 國立編譯館教科書高中歷史主任委員
- 2000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

學術榮譽

1. 國科會第一屆傑出研究獎 1985-1987
2. 國科會第三屆傑出研究獎 1987-1989
3. 國科會優等研究獎 1990
4. 中美學術基金會講座 1991-1993
5. 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2.7-
6. 教育部學術著作獎 1992.12
7. 新聞局金鼎獎 1993
8. 國科會第九屆傑出研究獎 1993-1995
9. 國科會第十一屆傑出研究獎 1995-1997
10. 國科會第一屆特約研究人員 1997-2000
11. 俄羅斯考古學會東方部榮譽外國會員2000-